新书评介

王锺翰师《清史余考》读后

刘小萌

2001年2月，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锺翰的新著《清史余考》，这也是锺翰师的第四部论文结集。

锺翰师的第一部论文结集《清史杂考》面世于1957年，其中针对当时清史、满族史研究中一些重大问题，如努尔哈齐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等，作出了坚实而有说服力的论证。该书充分显示了锺翰师治学的特长，既有从乾嘉学派一脉相承的旧史学的深厚功底，资料丰富、考证精详、立论严谨，又吸收西方汉学家的一些研究方法，重视多种语言工具的运用，注意把握历史现象的来龙去脉、因果关系，尤着力于对历史发展大趋势的总结。这种治学特长，贯穿于以后的研究中。

《杂考》面世未久，锺翰师即因所谓“反右”运动受到牵连，此后二十年内竟未能发表一篇文章，即便如此，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钻研不息，从而为后来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史料和心得。1978年被彻底平反后，锺翰师长年的学术积累终于迎来丰厚回报的时节，从此笔耕不辍。他自述：“从这一年（1978年）开始直到最近2000年，平均每年至少有一篇，多则两三篇”。1990年第二部结集《清史新考》问世，1993年第三部结集《清史续考》出版，今值八十八岁高龄，又出版了第四部结集《清史余考》。学者中如此高寿者已不是太多，依旧活跃于学术界的更是为数寥寥，至于仍能在学术上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新的，至少在清史、满族史界，锺翰师当无愧于第一人了。

《余考》共收锺翰师近作29篇，其中论文18篇，书序、书评、追忆等9篇，自述2篇。一部分论文，是对毕生学术实践的总结、反思、修正，还有若干篇论文，是对旧有专题的进一步探讨。

清朝前期满族社会发展问题，一直是史家关注的一个热点，1956年锺翰师连续撰写《满族在努尔哈齐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两文，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最高研究水平。而《余考》中《清朝满族社会的变迁及其史料》一文，是这方面的最新成果。先生利用满汉文原始资料，考证了“诸申与满洲”、“农庄与包衣”、“买与卖”、“书房与巴克什、笔帖式”、“汗、贝勒与王”等与满族早期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一些专用词汇，进而说明，满族历史文化、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的演变，无不受到汉族的深刻影响。

1644年清军入关，标志着明王朝的倾覆和清王朝的定鼎中原，是清史和满族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以往论者，多从清军入关对汉族社会的影响展开讨论，锺翰师《清军入关与满族的政治思想文化》则另辟蹊径，从民族间

[收稿日期] 2001-06-10
[作者简介] 刘小萌（1952—），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6

的融合、政治上的要求、思想上的追求、生活上的必需等方面，着力探讨清军入关对满族所产生的特殊作用和重要影响，进而提出：满族的政治思想文化不断汲取汉文化的丰富营养，并在康、雍、乾三朝逐渐发展形成；清代文化实际是满族政治思想文化与汉文化的化合物。这一提法，肯定了满族在清朝历史的特殊作用，对研究清代政治思想史也是富有启迪的。

入关之初，满族囿于传统社会制度的束缚，始终存在皇权与八旗分权之争，复因民族成见，满汉冲突不断。这些矛盾与冲突，在清统治集团内部得到了充分反映。同时，又穿插着官僚间因南北地域之别和朱王理学门户相异所衍生的党同伐异、相互构陷情事，使清朝的政局愈显扑朔迷离、诡谲多变。《清朝前期的党争问题》将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概括为：一、皇权与八旗分权之争；二、满、汉党祸之深；三、南北党人之争；四、朱、王理学之争；五、中宫党争之烈，均能穷源溯本，逐一道来。这对于理顺清前期政治发展的脉络、揭示乾隆盛世由以形成的基本前提，是很有价值的。

汉学研究一向有蒙古学、藏学、满学三大分支，在中国，满学研究的起步晚于蒙古学而早于藏学。它从 30 年代起步，几十年里，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也形成一系列聚讼纷纭的难题，诸如满洲名称、满洲始祖、满洲发祥地、雍正夺嫡等。围绕这些疑难问题，包括鍾翰师在内的中外史家曾展开多方探讨，而分歧的要点则归纳于《满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

鍾翰师于一些历史疑难问题，往往一而再、再而三地考察，几十年间锲而不舍，诸如清前期满族社会性质问题、雍正帝夺嫡问题等等，莫不如此。五十年前利用燕京大学图书馆藏传抄本《抚远大将军奏议》撰写《胤祯西征纪实》，对官书语焉不详的雍正朝西征史实予以说明。五十年后又利用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汉文档案撰为《康熙敕谕抚远大将军胤祯档》一文，不仅填补了胤祯西征史事中的缺略，对考察康熙帝晚年招抚蒙古、进军西藏与用人得失、晚年政治之成败，乃至雍正夺嫡内幕等问题，都有至为重要的关系。

鍾翰师研究雍正夺嫡问题，又连带引出康熙帝第八子胤禩、第九子胤禟的改名问题。

自来对康熙帝诸子中之第八子胤禩之改名为“阿其那”、第九子胤禟之改名为“塞思黑”，世俗相传“阿其那”、“塞思黑”即是狗、猪之意。国学大师陈寅恪先已指出，“其说至为不根。无论阿其那、塞思黑非满文猪、狗之音译，且世宗亦绝无以猪、狗名其同父之理”。确为不易之论。但阿其那、塞思黑究系何意，史学界争论已久，长期没有定论。为此，鍾翰师先后撰写了《释阿其那与塞思黑》、《再释阿其那塞思黑与满族传统文化》、《三释阿其那与塞思黑》，首先明确一点，胤禩之改名“阿其那”为自改，并改其子弘旺名为“菩萨保”，而胤禟之改名“塞思黑”系出自诸王，为他改，但两者均得到雍正皇帝的认可。以后，综合他人研究成果和新发现的满文档案复指出：阿其那、塞思黑的满文书写形式是 akina 和 seshe，而不是 acina 和 seche；阿其那作为人名，很可能源于 akiyan，意为夹冰鱼，他因为自己在储位之争中失败，自喻为俎上之鱼，任凭乃兄胤禛处置；塞思黑 seshe 的本意为“讨厌”，亦即以胤禟为“令人讨厌之人”；与胤禟同时改名的还有他的八个儿子，而所改名字也都含有讨厌之意。

鍾翰师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对阿其那、塞思黑两词加以诠释，主要是因为牵涉到雍正夺嫡问题。他说：“哪怕是一个改名的小问题，一旦只要有新材料、新见解，我还是愿意继续钻研下去的，问题讨论不厌其详，如果结论经不起时间的检验，翻案不但可能而且是完全允许的”（《满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这种科学求真的态度，贯穿于鍾翰师治学的全部历程，值得所有后学取法和学习。

鍾翰师说过，清史学科的一个特点，就是新史料的不断发现，使过去研究的问题重新受到检验，原有观点，或被否定，或被验证，或作进一步的修正。在收入本书的《洪承畴的历史功过问题》、《施琅的历史功过问题》、《李光地生平研究中的问题》等篇文章中，对于清史中的几个重要人物，重新审省，反复斟酌，力求给予公平全面的评价。以李光地为例，鍾翰师先曾在《陈梦雷与李光地绝交书》（收入

《续考》）一文中对李光地的卖友求荣、伪善可耻行径完全否定，但近十年来，通过对有关史料的研读和与国内外学者反复论辩推敲，最终得出结论，即其人尽管在政治上无多建树且权术诡诈，但与他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是两回事，不可混为一谈，且对于这两者都不可脱离特定的社会环境与时代背景妄加评议。从对李光地一生行迹的反复探讨，亦可见锺翰师的研究并未囿于对古人的品评，而是表露出自己对人生世事的感悟及为人处世的准则。

对于清代史料与制度的透彻把握，是老一辈史学家共同的优势，但能够熟练掌握满文并用以解决一系列难题的，即便在中青年学者中也并不多见。锺翰师的研究始终发挥了这一特长，凡是涉及满族史中关键名词和概念的阐释，乃至对一些重大专题的讨论，都努力从满文档案入手，以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他在《满族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贡献》一文中强调："对中国学者来说，如果想专攻清史和满族史而不懂满文，不能利用满文文献资料，亦是不啻隔靴搔痒，将始终不能抓住解决问题的关键"，确为不刊之论和经验之谈。而《满文档案与清史研究》一文，除了强调满文档案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外，还特别援举了自己以档证史的几个实例，以此说明正是满文档案，帮助自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从而使诸如明代女真人分布、清代旗地性质等一些基本课题的研究，取得新进展。

不过，锺翰师在充分肯定满汉文档案价值的同时，还说过"尽信档不如无档"。他结合自己考辨康熙帝遗诏出自伪造的实践，指出档案也有其局限，不应盲目信从。科学的态度，应是对档案进行严格鉴别、认真考核，进而得出结论。这一点，恰恰是有些研究者特别是一些中青年学者所忽略的。

锺翰师治史，从编纂引得开始，几十年来手披目验，对清代诸种文献的版本来源及史料价值，已经熟悉到左右逢源、融会贯通的程度。书中《陈梦雷与古今图书集成及助编者》、《四库禁毁书与清代思想文化》、《记半通主人藏半部"史通"》诸篇，无不显示在这一方面驾轻就熟的功力，而读者在阅读此类文章中也时时能够感受到他对书籍的嗜好和优游其中物我两忘的乐趣，对于今天新一代学者来说，这似乎已是一种难以企及的境界了。

至于《孟森先生与邓洪二师》、《洪煨莲师与引得编纂处》、《我为什么专攻清史和满族史》、《我和清史满族史研究》诸篇，对前辈学者治史特色、师承关系以及清史、满族史研究中应该关注的问题，均娓娓道来，对后学诸生具有向导和启迪作用。

还记得 1993 年锺翰师八十寿辰时，学界诸同仁与弟子集会祝贺，锺翰师曾有言曰：此番《续考》出罢，下次该出《余考》。当时认为很遥远的事，不想转瞬即成现实，锺翰师八十八岁高龄，尚有如此执著的追求，怎不令后学晚辈如我等者，敬佩之余，急起而直追？